

烽火青春志 抗日赤子心

——龙德洽与抗日反法西斯同盟的故事

□ 晓 晓

时,他被一致推举留校,任第一届毕业生实习指导委员会干事。站在转折点,龙德洽留校当晚便暗立宏愿——以师专为起点,誓将青年热血拧成抗日合力。

一、暗夜寻路:从思想觉醒到秘密小组组建

留校的龙德洽以同学信任为动力,通过研读资料拓宽认知,他清晰地看到民族危亡的紧迫性——东北沦陷、华北告急,而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妥协、对内“剿共”,与新桂系深陷割据,无暇抗日。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唯有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如黑暗之光指明方向。

内忧外患中,龙德洽抗日救国的念头愈发炽烈。他早在1934年春便与刘敦安商议找共产党;1935年春眼见山河破碎更让他迫切追寻,坚信“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出路”,无奈历经艰辛却暂未如愿。

时不我待,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深知“革命不能坐着等待”,即便尚未与上级党组织建立联系,他毅然决定组建秘密小组,模拟党小组功能,深入学生与民众开展抗日宣传,践行革命理想。

1935年暑假,龙德洽致信同窗好友刘敦安告知其计划获支持,广西师专二届学生陶保桓也积极响应。二人舍弃假期进行筹备:龙德洽通过书信与徒步动员首届同学,并强化在校学生宣传。二届郭英布、路伟良等,三届宁振邦、何励锋及四届莫效康等同学积极参与,以广西师专为核心、龙德洽与陶保桓为负责人的进步小集体就此形成。

二、星火燎原:大同盟创建与广西抗日火种

进步小集体活动期间,校园内托派思想悄然蔓延,其错误论调与进步思想围绕中国社会性质、救国路径及抗日主张爆发激烈辩论:进步学生坚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强调农民革命重要性;托派则宣扬中国为资本主义社会,主张依赖城市工人运动,反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后期更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龙德洽敏锐意识到:“思想统一才能行动一致”,进步团体急需一个有力的组织来引领方向,共同抵御错误思想的干扰,坚定地走

在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上。

1935年9月秋季开学,陈此生、杨潮、陈望道等进步学者到校任教,为学生带来新指引。龙德洽从陈此生处取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在进步学生中秘密传阅,使同学们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中心任务及党的主张有了深刻认识,为反托派、开展救亡活动奠定思想基础。

龙德洽与陶保桓带着筹备秘密小组方案向杨潮请教,杨潮带来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季米特洛夫报告及《八一宣言》等重要文件。龙德洽深入研究后,成立进步团体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这些文件在学生中秘密摘抄传阅,深入传播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

经数月的筹备,1935年10月,在杨潮指导下,龙德洽与陶保桓在路伟良等骨干共同参与下在广西师专秘密创建“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宗旨是团结青年与群众,开展抗日、反法西斯、反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活动。

大同盟成立后,龙德洽与陶保桓在雁山顶上、良丰圩边几处召开骨干会议,布置校内反托派斗争与校外开展抗日宣传。

在校内,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广西农村调查成果,组织学生通过壁报、演讲、研讨会等驳斥托派谬论,维护了党的六大关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决议。后期针对托派攻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陶保桓、陈大文以校刊《月芽》编委身份,组织盟员展开理论文化斗争,巩固了马克思主义阵地,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成为校园共识。

在校外,陶保桓在家乡指导建立融县“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开展抗日宣传。1936年2月至6月,龙德洽到苍梧县职业学校任教时,将“一二·九”运动精神及民族危亡形势融入教学,组织歌咏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成立读书会推荐阅读《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培养学生抗日意识。他还联合在梧州任教的同盟骨干梁寂溪、莫效康,带领歌咏队深入街头及东安石桥宣传;借新桂系“六一”运动(1936年6月1日新桂系发起的抗日反蒋运动)契机,带队深入村屯,结合“二五减租减息”动员农民,推动抗日宣传从城市延伸至农村。

龙德洽与陶保桓进一步拓展同盟影响,深入桂林多所学校开展活动吸纳盟员。首届毕业分配各地的刘敦安、麦世法、张镇道、凌焕衡、陈权、毛恣观等同学积极加入,在南宁、桂林、梧州等地掀起抗日救亡热潮。

三、旗帜更张:大同盟更名与纲领重塑

1936年7月,日军侵华步伐加剧,全国抗日呼声高涨。此时龙德洽已调至南宁广西民团干校任教,8月在刘敦安介绍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龙德洽结合全国形势与中共《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精神,意识到需通过更名与纲领调整,让大同盟更鲜明彰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抗日”立场,以精准呼应党的主张。8月中旬,经杜君慧引荐,他与刘敦安会见中共南方临时工委赵同志(据龙德洽回忆材料提供,具体姓名待查)汇报大同盟情况。赵同志建议调整名称及纲领,以适应党的策略转变。龙德洽遂与刘敦安、麦世法、张镇道、张海鳌、黄骏如等深入研讨,决定更名为“抗日反法西斯同盟”。

随后,由龙德洽与麦世法执笔起草同盟新纲领,经全体成员审定通过。其核心主张: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与法西斯,拥护苏联;国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阶层团结共同抗日。

四、薪火相传:更名后的同盟辐射与党组织衔接

大同盟更名后,龙德洽将情况告知在桂林的陶保桓,并印刷纲领传单分发各地进步同学,鼓励在群众中建立类似同盟组织推动抗日。他与陶保桓以新纲领为指导,在南宁、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加紧发展盟员和党员——龙德洽与刘敦安以广西民团干校为中心,陶保桓以并入广西大学文法学院的原师专为据点推进工作,为11月罗村会议“集体入党”决议提供了现实基础。

1936年11月7日,中共广西省工委党代会(罗村会议)召开,龙德洽以南宁地区党代表身份参会,会上报告了同盟成立背景、寻党经过及反托派斗争、抗日宣传工作,并代表全体60余名盟员提出集体入党申请。大会一致通过同盟集体入党决议(即经审查后分批履行手续,非简单集体宣誓)。这一决议直接推动广西省工委书记陈岸、委员黄璋赴各地办理盟员入党手续;龙德洽、陶保桓则以同盟负责人兼党员身份加速建盟建党。例如,11月12日陈岸赴武宣为韦敬礼、覃秉寿办理入党手续,建立临时党支部,1937年1月临时支部吸收韦世刚(韦天强)等后重新建立了

武宣县党支部,同年4月黄璋到武宣再将其升格为中共武宣县工委,推动群众抗日(1944年11月6日日寇入侵武宣时,韦敬礼率部打响了当地武装抗日第一枪);1936年11月,龙德洽、陶保桓参与徐敬五在桂林筹建中共桂林县委,该县委12月底成立后,半年内即发展7个支部。

此外,龙德洽加强城乡联动,深入兴安、灵川开展演讲,成立读书会,激发青年抗日救国热情。其他盟员以南宁、桂林为核心,向梧州、柳州等地辐射,构建城乡基层党组织与抗日网络,广泛动员群众,扩大革命影响力。

五、历史回响:同盟的历史定位与青春担当的三重维度

“抗日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迅速壮大,在中共桂林县委成立后作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开展活动,成为联结群众与党组织的纽带,更成为党组织发展的重要人才来源。廖联原回忆录记述了由盟员入党的经历;广西省工委书记陈岸在自传中高度肯定同盟贡献:其积极传播马列主义,推动救亡运动与反托派斗争,尤其在发展党组织和培养干部上成效显著。从中学发展的党员多为马列主义武装的优秀分子,毕业后分赴各县中学任教,将革命种子撒向全省空白县市;他们入党后又带动其他积极分子加入,推动广西各地党组织于1936年底后陆续重建,终成燎原之势。

1993年7月2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文件确认“抗日反法西斯同盟”为广西地下党秘密外围组织,这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肯定,更是对抗日奉献者的崇高致敬。

从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到抗日反法西斯同盟,这个由广西师专青年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意义特殊:个人层面,龙德洽与刘敦安、陶保桓等“未找到党时先仿党”,主动扛起抗日责任,展现革命青年历史自觉;地方层面,作为广西首个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为党组织重建输送骨干,陈岸“撒向全省空白县市”的评价印证其奠基作用;全国层面,同盟在各地发起的抗日宣传,与北平“一二·九”运动等形成呼应,成为广西响应全国救亡浪潮的直接体现。

回望那段岁月,龙德洽在暗夜中寻路、在斗争中聚力,他与战友创建的同盟不仅成为广西抗日救亡的重要力量,更彰显了广西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历史自觉与使命担当。这份以青春赴使命、热血护家国的精神,穿越烽火岁月,至今仍熠熠生辉。

志愿军战士余郁章：战场冲在前 战后不落伍

□ 陈德仁

余郁章,武宣县金鸡乡人。若非一次采访,或许不会知道这位身边的抗美援朝战斗英雄……

出生于1932年11月的他,原是石龙县(今武宣县)黄茆公社赖山大队人。新中国成立前,他靠在地主家放牛打工糊口。

1950年6月,年仅18岁的余郁章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在村里带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经短期训练后,1950年11月25日,他随志愿军西线6个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向美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

至1951年3月,余郁章所在的38军113师连续参加多次战役。初上战场,他在担架营13连任连部通信员、卫生员。第二次战役中,部队深入敌后穿插迂回,在三所里、龙源里切断敌退路,阻敌南逃北援。

敌军为抢占先机,对阵地展开长时间狂轰滥炸。阵地上焦土遍地,燃烧的树枝散落各处,战壕里横七竖八躺着身负重伤的战友。余郁章的主要任务是包扎护理并转送伤员——从战场将伤员或烈士遗体抬回后方。因个头矮,抬担架时伤员的腿脚常碰到他的耳朵,他咬着牙,一脚高一脚低地将伤员送往后方。一次,一颗炮弹呼啸着向阵地飞来,他猛然跃起扑过去将连长压在身下。爆炸后,几块弹片嵌入他后背,棉衣被鲜血浸透,险些丧命。还有一次,几颗炮弹落下,他的钢盔帽带被震断飞出数米,右胳膊被炸伤,人被埋进弹坑。战友将他刨出后,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转身便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最前线。战场上,他先后抢救并转送伤员60余名。

1951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授予他抗美援朝纪念章。

1952年10月,美军发动“金化攻势”(即上甘岭战役)失败后,开始筹划在志愿军侧后方登陆。其军舰和舰载机频繁轰炸中国沿海港口,为登陆作战做准备。靠近中国的西海岸成为主要防御方向,志愿军西海岸防御指挥部下令迅速修建以坑道和钢筋混凝土工事为支撑点的海防工事,保障正面防线纵深及侧后安全。

针对西海岸清川江口至石秀山以北565公里段地形开阔、无险可守的实际情况,西海岸指挥所制定海岸防御作战方案,确立“坚决阻敌于海上”的作战方针,在沿海第一、第二线重点地区构筑坚固防御工事和坑道。

1953年1月初,海防工事修筑工程



▲余郁章



▲1956年,石龙区乡干部合影,第二排右二为余郁章。

正式启动。

时值朝鲜最寒冷的季节,气温达零下20℃—30℃,冻土层厚达1米。全体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昼夜施工。缺少炸药,余郁章和战友便冒险拆解美军未爆炸弹,废物利用;工具不足,他翻沟耙坑,将废旧钢筋制成代用器械;无机械挖掘,就用铁锹挖、镐头刨,往往一镐下去仅在地面留下浅浅的白印。尽管条件艰苦,余郁章和全连指战员的棉衣仍被汗水浸透,烤一烤又继续挥锹抡镐。大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赶在“联合国军”登陆前,筑起一条坚固防线。

望着战友手上磨出的血泡、渗满鲜血的纱布,再看看已修建的交通壕、单个掩体,以及一条条反登陆、反坦克、反空降坑道工事,余郁章深感数月辛劳未白费——西海岸阵地工事脆弱的局面已彻底改变。

1953年8月29日,余郁章因在西海岸修建任务中表现突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3师后方勤务处表彰,荣立三等功一次。其《志愿军立功证明书》立功事迹记载:“工作主动积极,带领一个小

组完成修建任务成绩突出,不计较个人得失,团结同志。”

因表现突出,余郁章随后被调至9495部队高机连任班长。该连每班八九人,配一挺高射机枪,专门对空射击低空、体积小而速度慢的敌机。他将高射机枪隐蔽布置在高山环形掩体内,自己却站在无任何防护的高岗上,用旗语指挥射击方向。因作战频繁搬运武器、扣动扳机,他手掌和食指磨出厚厚老茧。反登陆备战期间,全班击落击伤美F—4U战机5架。

1953年,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赠予余郁章“和平万岁”纪念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授予他人朝作战纪念章(已遗失)。期间,他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颁发的军功勋章。《证书》用朝鲜文写道:“为保卫祖国,在与敌斗争中付出巨大努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特授予军功奖章,以兹证明。”这些奖章及证明书,成为他浴血奋战的见证与永久纪念。1954年9月30日,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3月,部队陆续撤回国内。撤回时,全连在战场牺牲过半,仅剩9名战士。

退伍返乡后,余郁章仍保持军人本色,为党和国家事业贡献力量。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转入全面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年9月,余郁章任石龙区(今武宣县)乡干部;1957年,赴三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影响,改进干部作风,推进农业集体

化与现代化。后因父母年老多病,申请返乡照顾。

1969年4月起,他先后任黄茆公社赖山大队民兵营长、党支部书记,获武宣县劳动模范、优秀村干部、“五好家庭”等荣誉。全国农业学大寨期间,他前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参观,学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人定胜天”的大寨精神,响应毛泽东号召发动“农业学大寨”活动。1977年,他当选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年底赴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任赖山大队党支部书记10余年间,他带领群众填沟壑、引渠水、开荒山,精心耕作,将赖山建成“小平原”,实现水稻等粮食作物高产丰收。

改革开放后,他依托党的富民政策,打破单一粮食生产结构,拓展增收渠道。宣传动员社员将猪、鸭、瓜、菜、油等家庭副业发展为支撑大队农村经济和农民致富的主导产业,并推动集体养猪场建设(年出栏600余头),改变了群众“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田,养鸡养鸭为换盐,种瓜种菜不卖钱”的旧观念。余郁章因此被武宣县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并获“学雷锋、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五讲四美)”奖章。作为先进典型,他常戴大红花赴其他公社交流经验。

1980年至1984年,余郁章被提拔



▲笔者向余郁章妻子莫凤娥(前排左二)、儿子余佩华(右一)了解余郁章当年开展的各项活动和功绩。(林柳军 摄)

为黄茆公社贫协副主任。1984年6月27日,他因病提前离休,由中共武宣县委组织部颁发离休干部荣誉证书。同年10月,人民公社撤销,金鸡乡成立,赖山村划归其管辖。1985年7月,老党员余郁章因病去世,用一生践行了“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事业奉献”的初心誓言!

余郁章从战场冲锋到归乡耕耘,始终将浴血奋战得来的荣誉珍藏于一只旧

箱中,隐于看似平淡却饱含激情的岁月里。离世38年后,笔者采访其妻莫凤娥及儿子余佩华。“父亲常教导我们:‘做人要踏实,过往无需炫耀。’”余佩华说。

通过家属口述、史料及照片,笔者深刻感悟:这是一位平凡人的高尚人生境界,更是一名退伍军人的精神闪光。谨以此文,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奋斗的前辈致以崇高敬意!



▲余郁章荣获的“和平万岁”纪念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